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历史学基础课系列教材

中国历史文选

(下册)

汝企和 主编

张升 副主编

ZHONGGUO LISHIWENXUAN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历史学基础课系列教材

中国历史文选

ZHONGGUO LISHI WENXUAN

(下册)

汝企和 主 编

张 升 副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文选. 下册/汝企和主编.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9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历史学基础课系列教材
ISBN 978-7-303-09490-5

I. 中… II. 汝… III. 史籍 - 中国 - 古代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K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5605 号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 bnup. com. 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5
字 数: 272 千字
印 数: 1~3 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责任编辑: 李雪洁 陈佳宵 装帧设计: 高 霞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马鸿麟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北京师范大学新世纪历史学教材编辑委员会

顾 问 何兹全 龚书铎 刘家和

主 任 郑师渠

副主任 杨共乐 李 帆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卫东 王桧林 孔祥民 刘宗绪 张建华

周启迪 施建中 晁福林 郭大钧 郭小凌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系业已成为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不仅学术上出精品，而且注重教学改革，更新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完善课程结构。

历史学系的教学改革前后历时20年，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深化于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改革由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持，重点放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方面，因具开创性而获得1989年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教学改革继续深化。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学，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并与历史学系进入“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教学需求相配合，历史学系组织教师编写并出版了一套历史学专业基础课教材。这套教材涵盖了历史学科各门主干课程的内容，基本满足了本科阶段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学习需要，在系内的多轮使用中，得到学生的广泛好评。同时，由于具有编审谨严、结构合理、分量得当、适应面广的优势与特色，这套教材在各高校历史学科受到普遍欢迎。

时至今日，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历史学系又在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与特色设计发展之路。按照学校的部署，组建了新世纪历史学教材编辑委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首先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编写出版的历史学基础课教材进行修订，力求通过高水平教材的修订与使用，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新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这次修订，仍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原则，结合学术发展与教学改革的需求，加入新的学术成果与教学理念，以顺应当今高等教育和历史学科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为21世纪的大学历史教育提供一套较为新颖、完善且适用面广的基础课教材。考虑到这套教材已具备的特色与优势，所以总体框架上不拟作过多更动。具体而言，原有章、节、目结构大体不变，全书正文前加图片若干，正文中根据内容需要附插图、地图，每章之后附有若干思考题，全书后附参考书目。根据学校新的教学计划，个别书名作了调整，《历史学概说》改为《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世界现代史》与《世界当代史》合为《世界现代史（1900—2000）》。

按照高等院校历史学科现行的课程设置，并考虑到教学上的实际需求，《中国近代史》仍仅包含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 80 年的历史。中国现当代史课程仍分《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两部分教材。

本次修订，虽作了部分更动，一些方面得以完善，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方家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新世纪历史学教材编辑委员会

2004 年 5 月

本部教材首次出版于1999年，迄今将近十年。总体来说，这一教材最大的特色是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此三学古代合称“小学”）内容统领全书。这主要基于如下考虑：课程目的的要求，大学课程与中学课程质的区别，以往教学实践的启示和中学文言文课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中国历史文选”的课程目的，学术界历来看法不一（这些歧异观点集中反映于两辑《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和已出版的各教材之中）。我们认为，这门课是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并以此为出发点来设计这门课程的内容。无论学习何种语言，最基本因素皆为字词和语法，古汉语亦不例外。古汉语语法与现代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许多古汉语语言现象又非语法所能涵盖，因此古汉语字词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以往的教学实践充分表明：对于古汉语特有的语法规律，学生掌握起来比较容易，短时间内就能有较大提高，而字词方面若想有明显进步，则须长时间积累。语言大师王力先生曾在《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中指出：“我们在研读古代汉语的时候，……应该首先抓哪一方面呢？我想应该先抓词汇方面……语法方面固然很重要，但是由于语法是比较稳固的，古今差别不大，只消知道几个粗线条，再学习一些古代虚词，也就差不多了。至于词汇，它是变化比较快的，……所以先抓词汇方面是对的。”

要掌握字词，不外乎形、音、义三个方面。众所周知，古人对汉字的形、音、义，千百年来已作了极为深入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当中。这三项专门之学作为本科生课程，一向由中文系开设，历史系本科生迄今很少有设这些课的。然而作为历史系的语言工具课——“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适当引入“小学”的实用部分却完全必要。

“中国历史文选”与中学的文言文课紧密相连，作为大学课程，除在量的方面大大扩展外，与中学课程质的不同在于：大学除传授知识外，还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用现在常讲的话说，即要提高学生的能力）。而“小学”的研究成果，恰为驾驭古汉语字词提供了最佳途径。学生掌握了这“三学”的实用部分，就可对每个汉字有非常深刻

的理解，从而不但可准确把握每个字的各种含义，而且还可举一反三，即在离开教师之后仍能运用这些知识不断提高古汉语水平。正如刘家和本先生指出的：“这种方法给予学生的就不止是一杯水或一桶水，而是给了他们长流水的水源。”刘先生的话，指出了“中国历史文选”的发展方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往的实践表明，引入“小学”知识确为解决“文选”教学难点的有效手段。从上述两部论文集中不难看出，有不少同行在这方面已作出宝贵探索。如陈虹先生在《历史文选与古代汉语》一文中，以数则精彩例证，说明运用音韵学知识可使教学中的疑难迎刃而解。她在文中总结道：“音韵学这把钥匙，就是这样为同学们打开了众多的知识大门。”在1997年全国“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讨会上提交的《历史系古代汉语教学之我见》一文中，她更进一步总结出运用“小学”内容教学的方法，即文字学方面，“第一是要讲透每个汉字部首的含义”，“第二则要讲清汉字字形在历史长河中的诸次演变”；音韵学方面，“形声字、多音字则同样可以利用来作为（音韵学）明白易懂的范例”，等等。

孙绍华先生也在《历史文选教学中的辩证法》一文中指出：“学生自从掌握了钱大昕在声母上的新发现：‘有舌头，无舌上，有重唇，无轻唇’之后，对大量类似‘匪’读‘彼’以及据此形成的通假关籥，几乎是一点即通。”“由于平时在教学中，对于阅读古籍，强调要善识通假，运用古音韵知识解决疑难，引导学生从音韵角度切入，问题往往迎刃而解。”她还明确提出了要“从汉字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功用”的观点（见《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2辑）。1997年的研讨会上，梅显懋先生亦在《浅谈启发式原则在中国历史文选教学中的运用》一文中指出：“当教师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等知识来疏通文义时，学生往往表现出极大兴趣。”此外，论及在教学中运用“小学”知识的，还有刘启林先生的《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法摭言》等文章。总之，以往的大量实践雄辩地证明：将“小学”知识引入课堂，不但完全可能，且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近年来中学文言文课水平不断提高，已发生很大变化。对于这些变化，有人进行了深入研究与精确统计，并编纂成《中学文言文所引词典》。编者的编纂动机，就是因发现“十年间（大学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之所以愈来愈不尽如人意，关键在于我们对中学的实际情况不明，教学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偏低了”，因此，“为了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现状”，“特地”编修此书。（本段与下段引文皆见韩峥嵘先生《古汉语文献导读》之“前言”）这部词典“把选入初、高中语文课本的一百九十二篇诗文所出现的全部词语和句子收揽无余”，而且对“中学语文课文言课文的词汇蕴含量”进行了“精确统计”：“其总量为八千六百二十四个，去掉人名、地名则为七千三百九十四个，其中

单音词为三千三百四十二个，复音词为三千八百六十九个”。词典作者还将这些数字与迄今影响最大的古汉语课本——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进行比较，其结果为：“《古代汉语》为二百六十一篇，中学语文课本为一百五十篇，在《古代汉语》所选的二百六十一篇诗文中，有三十二篇已为中学语文课本所选，占百分之十二点三。”更重要的是：“《古代汉语》所要求学生注意掌握的一千一百二十三个常用词，只有七十五个不见于中学课本，仅为其百分之六点八。”据此，韩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以上几点足以说明，中学语文的文言文部分比重大大增加，教学相当深入，已经和前些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根据中学文言文教学的深化，古代汉语教学的立足点、出发点必须相应提高这个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现行的古代汉语教材是需要更新的。”此文虽为中文系教授所作，但文章对中学有关情况的统计与分析，对“中国历史文选”课同样具有深刻意义，因为两系学生在中学的文言文基础完全相同。我们也必须考虑当前中学的情况，在教材中作出相应变化。

从上述统计中还可看出，中学文言文教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量的方面，如文中“揭示”了“几个常用文言虚词在中学课本中出现的次数”：“之，二千二百五十次；其，七百六十八次；者，七百六十一一次；所，三百三十九次……”这些数字生动表明：中学教学已为学生提供了比十年前丰富得多的感性知识，而大学的古汉语教学则应在质的方面有所提高，即更加着力于将学生丰富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高度，而“小学”知识恰是对汉字形音义的理论总结。因此如果说，二十几年前将“小学”内容引入“中国历史文选”教学尚为时过早的话，那么今天，引入“小学”内容已变得日益迫切了！

本教材突出上述特色的尝试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

第一，知识介绍。我们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实用的内容深入浅出地摘编为短文，置于每册书之首，并精选历代名家关于小学的论述若干篇，附于短文之后。讲课时，将上述内容适当穿插于各篇课文之间进行讲解（其中易懂者则作为练习让学生翻译）。这样安排，首先是将小学知识摆在课本最突出的位置，已引起学生充分重视。而更为重要的是切实以这些知识贯穿全部教学始终，以使学生逐步加深理解，从而最终达到能独立运用这些知识来解决阅读中难题的目的。

第二，选篇。我们所选名篇，多为先秦、两汉之作，如前四史、子书和大部分经书等，这些名篇恰为中国历史上被后世学者注释最多的篇章。如《周易》一书，几千年来对其诠释、研究之书竟达三千余种，在这方面古今中外没有哪一部著作可以与之相媲美，堪称世界之最。对其他名篇的注释也往往超过原文几倍、几十倍，这些注释是“小学”资料的渊藪，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选这些篇章，非常便于教师展开讲授“小学”内容。

第三，注释。我们在新教材注释中也注意引入“小学”方法。如《尚书·牧誓》的第一句为“时甲子昧爽”，其中“昧”为“暗”，学生容易理解，而“爽”为“明”则不易懂，我们在注释中指出：“爽，会意字，字形像古代窗棂，其空白处表示透进的光。”与仅仅注“爽”为“明”相比，这样注释显然可使学生对字意的理解深刻得多。又如《书教下》引《易系辞》的“（易）穷则变”一句，“穷”很容易被误解为“贫穷”。我们在注释中指出：“穷，身躬于穴，表示无出路之意。”这样从字形中分析字意，生动形象，可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第四，实习系列。以往教科书中，仅有几部有练习题，罕有安排实习者。我们于1994年设立文献实习室，故此次新编教材，首辟实习系列。该系列前两单元为实习如何使用工具书，后几单元则是实习如何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角度剖析与理解汉字。

笔者认为，大学学生在四年内能学会使用多少种工具书，是其学术水平高下的主要标志之一。多掌握一种工具书，其自学能力便增长一分，这对古汉语学习尤为重要。要想真正掌握“小学”知识，有些工具书（如《辞源》《说文解字》《古文字类编》等）必须学会使用。以前课上我们也向学生介绍工具书，但由于没有教师指导下的实习，对一些较复杂工具书的使用，学生课上似乎学会了，但课后仍不会查。近年来我们在实习室内带领学生查找工具书，对于查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当堂即给予指导和解决，这样学生很快便可掌握。

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本身即为实践性较强的学科，白兆麟先生曾指出：“显然，综合性和实用性是这门学科（指训诂学）的两大特征。”（见《简明训诂学》之《导论》）我们向学生介绍时，又偏重于其实用部分，因此要掌握这些内容，实习就显得格外重要。这次新编教材，我们制订出围绕“小学”知识的实习系列内容，并将其按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次序分置于两册之中。

在选篇方面，这部教材也有一些与其他选本的不同之处。

第一，首次选入“小学”篇章（详见上文）。

第二，首次遍选四书五经。以往的二十多种教材，无一例外都选了经书，但对群经之首的《周易》却很少有人问津；选《论语》《孟子》者甚多，而选取《大学》《中庸》者亦鲜有闻。这次我们不但选入《周易》，且全文选入《大学》和《中庸》，从而使本书成为遍选四书五经的第一种选本。

众所周知，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五经就成为历代选官取士的必考内容。两千年来中华大地上每一位知识分子，特别是管理者与各方面的杰出人物，无不自幼苦读经书，将其内容烂熟于胸。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各层管理者——从天子到大臣，直至县乡官吏，亦无不尊奉经书为其统治的最高指南。四书为南宋大理学家朱熹选定，其《四书章句集注》也成为后世知识分子

必读之书。元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十一月，元仁宗下诏定考试科目曰：“考试程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自此后考试皆在四书范围内出题，明清数百年间一仍此例。故四书对中国六百年封建社会后期的影响，亦为其他任何文献所无法相比的。四书五经的思想，已溶入千百年来知识分子，特别是国家各级管理者的血液之中，成为指导他们处理一切国政大事的最高原则。从这一事实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五经（后期包括四书）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文献，因此也应是我们的《中国历史文选》应首先考虑选入的篇章。

“中国历史文选”课的早期开拓者一直在考虑如何使这门课更好地为学生学习历史服务，但其效果正如白寿彝先生所指出的：“最初是强调跟中国古代史相配合。做了一个时期，大家都感觉到这个办法行不通。文选的一篇文章，往往需讲上一两个星期，古代史的几百年过程有时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讲完，这两门课说什么也配合不上。”笔者认为，选学四书五经，就是将《中国历史文选》与中国古代史真正配合的方法——这是一种高层次的配合，有了这种配合，才能对千百年来中国各级统治者共同尊奉的指导思想有较全面的了解，从而也才有可能对其间的社会变化取得更深层次的理解。

第三，首次选入佛经、道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史学界逐渐拓宽眼界，将研究触角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我们这次编修，除注意选取竹简、诏令奏议、笔记文集、类书等篇章外（甲骨文、金文已成专门之学，故未选），还特选佛经、道藏各一篇。

佛教自东汉传入华夏大地，近两千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最高统治者到庶民百姓，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其直接、间接的影响（笔者认为，对反宗教者来讲，宗教同样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只是影响的性质不同而已）。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古代统治思想、伦理学乃至养生学等，无不带有其印迹，历史上以道教为旗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也为人所共知。人们常以儒、释、道三者并举，就说明在中国历史上，这三者皆起过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亦须对释、道有所了解。

近代以来，不少史学巨匠已将研究触角深入宗教领域。如陈垣先生曾撰写《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专著。（见《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他还撰写了《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道教亦有所探研。当代著名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刘家和先生等也都对释教有所研究，并撰写了重要论文。我们的《中国历史文选》不可能全面介绍释、道二教，然让学生了解佛经、道藏亦为重要史料，却十分必要。我们选入佛经、道藏，正是基于这种

考虑。

第四，别具特色的白文选篇。与以往相比，本教材中的白文选篇有两个特点，一为所选之书皆与前面所注释之书不同，这样可使学生接触更多史籍，拓展其史学眼界；二为对习见史书，注意选取其最具特色的篇章。

在教材的使用过程中，教育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使我们的教学与时俱进，在保持上述特色的前提下，本次修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将近年来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新教材的内容。

近十年来笔者对术数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纠正了原书中注释欠妥之处，如对原第2册41页《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的注释进行了修正。

同样，由于笔者近年来对《周易》进行了研究，从而发现了原注释中的问题，如对原第2册112页《汉书·艺文志序》中“于是始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的注释作了修改。

第二，删繁就简。

为适应多数院校的教学情况，在保持原书优点的基础上，将原书的三册缩编为两册，将选篇内容压缩约40万字，使之更为精练；同时将原书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而辨识繁体字的任务则由实习课与作业来承担。这两项重大的改变，使这部教材适合于多数院校的实际情况，因此使之更适于推广。

第三，纠正原书印刷中的错字与标点。

本书初版之前，为保证高质量，责任编辑、笔者与校对工人先后进行了五次认真的校对，然而可能是由于当时激光照排技术的问题，书内仍然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错误，如将“虞国”误为“覩国”（第1册200页），将“行义”误为“行乌”（第1册249页），将“凭证”误作“鞮证”（第2册56页），将“千里”误为“千颺”（第3册53页）等。这些显然不是常见的因形似、音似而造成的谬误。这次修订，经过认真的校对，纠正了原书中的上述谬误，进一步保证了教材的质量。

修订过程中，还将原书中注释超过30条的段落进行分段处理，使注释与原文衔接得更为紧密，从而更便于阅读。

编写这样一部涉及许多专门之学的教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前辈、同仁不吝赐教。

汝企和

2008年2月



目 录

“小学”基础知识	001
音韵学常识	001
反切	001
声母 韵母 声调	002
上古音韵系统	004
音韵学选篇	006
古无轻唇音 (节选)	006
古今字音之变迁	008
训诂学常识	010
训诂的方法	010
古注的术语	014
训诂学选篇	017
说文解字注序	017
释相	018
新注选篇·史部	021
正 史	021
隋书·经籍志序	021
新唐书·魏徵传 (节选)	029
宋史·朱熹传 (节选)	034
明史·戚继光传	040
编 年	048
资治通鉴·司马光论三家分晋	048
明实录·作铁榜申诚公侯	052
纪事本末	055
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 (节选)	055
杂 史	064
国语·邵公谏厉王止谤	064



国语·越王句践灭吴	066
战国策·苏秦始将连横	071
史 评	076
史通·二体	076
史通·直书	079
文史通义·书教(下)	081
政 书	087
通典·职官一	087
通志·总序	100
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七(节选)	119
诏 令	129
唐大诏令集·戒厚葬诏	129
书 目	131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上谕	131
新注选篇·子部	133
老 子	133
道德经上篇(节选)	133
庄 子	138
秋水(节选)	138
吕氏春秋	147
尊师	147
容斋随笔	152
野史不可信	152
日知录	155
姓氏	155
大藏经	159
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节选)	159
抱朴子	163
论仙(节选)	163
新注选篇·集部及其他	168
韩昌黎集	168
诗辩	168
包拯集	170
乞不用赃吏疏	170
睡虎地秦墓竹简	171



田律	171
古文献常识	173
天文	173
历法	178
地理	187
职官	191
姓氏	201
避讳	206
车马	209
衣饰	211
白文选篇	215
魏书·释老志（节选）	215
尔雅·释诂（下）	220
附录 实习系列	221
实习一：音韵学（一）	221
实习二：音韵学（二）	221
实习三：阅读线装书	221
实习四：训诂学（一）	222
实习五：训诂学（二）	222
再版后记	223

音韵学常识

音韵学又叫声韵学。它是分析研究汉字的字音及其历史变化的一门科学。它跟语音学不一样，只有汉语才有。

要学习音韵学，首先应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语音是有变化的。语音的变化，在时间上表现为古今音的差别，在空间上表现为现代方言的差别。这一点其实我们很好理解，因为方言的差别是明摆着的，而古今音的差别从古书中就可以看出来。

传统上的音韵学分为三类：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所谓古音学，就是上古音韵系统，主要指《诗经》音韵，以研究《诗经》为主。所谓今音学，指的是隋、唐、宋时期的语音，其中以研究《广韵》为主。等韵学以宋、元以来的等韵图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切韵》语音系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普通语音学，是探讨语音学的一般原理的。

音韵学范围那么广，应如何入手呢？应先从反切、声母、韵母、声调这些基本概念入手。

反切

“反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注音方法，它是用两个汉字注出另一个汉字的读音，如：当孤切都。反切的基本原理是：上一个字取声（声母），下一个字取韵（韵母，包括调）。一开始古代人并不知道如何取声、取韵，只是把两个字连起来，连读快一点，便切出这个字的读音。

关于反切的起源，一般都认为是在汉末。汉末佛教传入中国，佛经是由梵文写的。梵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中国学者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受到梵文拼音

的启发，于是创造了反切注音法。

反切早期不用“切”字，只叫“某某反”，或“某某翻”。到了唐代，皇帝很忌讳“反”字，怕老百姓造反，才将“反”字改为“切”字。“反”和“切”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反反复复、反复切摩的意思。

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反切用字，所以有些反切，我们切不出正确的读音，如：古红切，上字取 g，下字取 óng，切出来的字，普通话没有这个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近现代的平声字有阴、阳之分，古代则没有。那么，依古代的平声怎样读出现代的阴平、阳平来呢？这就有个规定（这些规定是文前的音韵学家总结出来的）：反切上字是清声母，切出阴平；是浊声母，切出阳平。“古”的声母是 g，清声母，所以应念阴平 gōng（公）。又如：同都切，同是浊声母，阳平，切出“徒”字。我们再看看另一个例子：古奚切 gī，普通话中也没有这个音。原来古代的 g、k、h，后来在齐齿呼或撮口呼的前边变成 j、q、x，所以这里 gī 应念 jī，古奚切鸡。所以我们要看懂古代的反切注音或者自己切出古代的注音，就必须知道一些反切规则。

反切注音较之以往的注音方法是一个大进步，但仍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必须是反切上、下字都会念；古今音和方言的问题，反切不好解决；反切用字太多，记起来很麻烦，如此等等。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在不断改进着反切注音方法。明末吕坤《交泰韵》、清初潘耒《类音》等韵书中，设计了一套新的反切。首先，讲究用字，如：四呼一致，开口切开口，齐齿切齐齿，合口切合口，撮口切撮口。这种方法便于切出字音。其次，将反切下字改用以元音开头的字（即零声母字），如：笃翁切东（原来是德红切东），翁 wōng 是零声母字，这样也便于切音。但是，元音字母开头的字不好找，有时只好用生僻字，这样反而又增加了麻烦。后来，清人李光地《音韵阐微》一书中，在前人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尽量不用生僻字。如碰到上面那种情况，宁可用非零声母的常用字。旧版《辞海》《辞源》都采用李光地的方法。

但不管怎样改良，仍然摆脱不了用汉字去给另外一个汉字注音这样一种局面。唯一的出路是用拼音字母来注音。

声母 韵母 声调

一个汉字所代表的语音单位叫音节，任何一个汉语音节均包括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内容。古代人并无所谓声母、韵母的概念，他们称声母为声、声纽、纽，韵母为韵、韵部、部，声调为调。

（一）声母

古代没有音标，就用一个汉字来代表一个声母，共有三十六个：（1）帮、滂、并、明，重唇。（2）非、敷、奉、微，轻唇。（3）端、透、定、泥，舌